

Understanding Metonymy:
A Cognitive Pragmatic Perspective



认知语用研究： 词汇转喻的理解

江晓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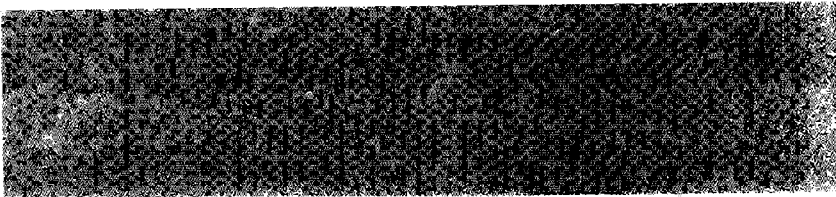
Understanding Metonymy:
A Cognitive Pragmatic Perspective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认知语用研究： 词汇转喻的理解

江晓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知语用研究：词汇转喻的理解 / 江晓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

ISBN 978 - 7 - 5004 - 7702 - 0

I. 认… II. 江… III. ①认知科学：语用学 - 研究②词汇学 - 研究 IV. H0 - 05 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728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安 然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罗纳德·兰盖克(Ronald Langacker)等著名语言学家开始系统地引入、传播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为深入探究隐喻、转喻等普遍语言现象的生成与理解提供了新视角、新的理论构架。此后,学者们不断尝试,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进入 21 世纪以后,语言现象的认知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出现了很多与认知有关的新兴学科、界面研究,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等的发展便是很好的例证。

转喻就是借用某物或某人的一个部分、一个因子去指代其整体、或整体代局部,已被普遍视为人类认识世界和传播意义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然而,与隐喻相比,学者们对转喻的探索维度、深度及所取得的实际成果要少很多,这说明转喻研究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存在继续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转喻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如转喻与隐喻的界限、转喻激活、转喻联想与推理、转喻的认知功能、转喻生成的语境制约、转喻理解的认知机制与认知效果等还远未明晰,有待深入剖析,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破解有关人类思维与认知的“黑洞”,也根本无法推进人工智能等信息处理的真正发展;另外,语言教学与学习、二语习得、翻译等也都难以回避语言使用中的转喻现象。总之,转喻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

对比国外学者所取得的成就,我国的转喻研究还有更多需要深入拓展和探索的领域,尤其应重视汉语中的转喻现象、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喻对比等,借助并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横

向与纵向的全面分析,尤其是转喻涉及的认知问题。2006年7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的全国语用学讲习班及专题研讨的系列讲座期间,国际著名语用学家、关联理论创始人之一的D. 威尔逊(Wilson)教授指出,隐喻、转喻等喻式用法都应成为认知语用学、词汇语用学等的研讨对象,因为它们的使用和理解不是语言编码与解码的简单问题,离不开话语信息处理时的语用充实和认知效果等,并多次提醒我们应多加重视汉语中各类语言现象及其与英语等语言之间异同的语用认知对比分析。

转喻研究并非易事,但令人欣慰的是,以上各方面的尝试正逐渐增多。《认知语用研究:词汇转喻的理解》就是江晓红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迎难而上,饱尝艰辛后所取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从论文选题到专家论证、从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从论文答辩到获得学位,再到出版前的修订与文字打磨,我都见证了她锲而不舍的努力与收获的喜悦。该书吸收并融汇了认知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成果,就汉语中的词汇转喻进行了认知语用视角下的专题研究,这对进一步探析转喻理解的认知语用制约与效果等具有积极意义,利于揭示词汇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某些缺陷等,我相信读者可从中获得启示。当然,语言交际中转喻的生成机制和理解机制都涉及十分复杂、且深藏不露的认知因素和语用理据,诸多疑难问题仍亟待深入发掘与诠释,甚至实验求证,可以说,转喻研究还存大有可为之处。

阳春三月,是为序。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2009年3月10日

序 二

江晓红原是我的博士生,本世纪初我们相识于山城重庆。我们认识时她刚好在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取得了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她通过不懈的努力,考进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我的门下攻读语用学方向的博士学位。

现在,晓红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付梓前夕来电向我索序。我欣喜之余,颇感内疚。回想当时在读的博士生中,晓红因好学勤奋而被师生们广泛称道,她交给我的每门学位课程读书心得总是厚厚的 A4 打印纸一百多页。她是一位语言学基础扎实、善于思辨、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而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晓红完成了我讲授的全部博士学位课程,正满怀信心投入论文开题报告之时,我因身体及其他原因向学校提出退休申请。获准后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将我的“爱徒”转交给我的接棒弟子——冉永平教授,由他代替我来指导晓红。晓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意外,而我更因为不得不阵前换将而在内心上产生一种内疚和不安。我极力自我安慰之余,不断鼓励晓红,鼓励她只要她虚心好学,在冉永平教授指导下一样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曾几何时,晓红在冉永平教授的指导下,选择了词汇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结合研究作为她的研究课题,开始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艰苦历程。曾几何时,她展示出自己在语言学方面的实力: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与她论文有关的专论;国内有关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学术会议上常常见到她的身影,见到她与同行学者交流;她还经常虚心求教于冉永平和我,听取我们两人的意见和建议……晓红几经艰辛,数度易稿,终于把一个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前沿课题攻下来了:2008 年的一个夏日,我亲临答辩现场,见证了晓红顺利通过论

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关于晓红的学位论文《认知语用研究:词汇转喻的理解》的学术意义和创新成就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她的论文导师已在序言中做出十分中肯的评价。看到弟子们一个个地成长,我心中产生极大的欣慰。我希望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将随着年轻学者们的成长而得到更深入、更迅速的发展,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创建我们自己的语用学理论,并让它早日走向国际。

何自然

2009年3月

于广州白云山

前 言

转喻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转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修辞学研究把转喻看成是一种修辞手段，相当于汉语修辞格中的“借代”。《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以“四海之内”代“四海之内的人”。但是，随着转喻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转喻不仅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感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的名著《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不但引发了对隐喻研究的狂热，而且也标志着转喻认知研究的开始。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转喻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认知层面上，认知语义学一方面揭示了转喻的概念本质，使转喻的研究走出了传统修辞的樊笼；另一方面，人们在惊喜于研究视角的拓展时，也开始反思“转喻思维”无所不及给语言研究带来的困扰，不同类型的转喻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因而，细化研究对象，确定研究类型有助于人们对转喻的认识更为深入。转喻既是一种认知机制，也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现象。目前，言语交际中词汇转喻的识别和理解研究还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研究以非规约性词汇转喻为主，属于狭义层面上的转喻研究，以区别于广义层面上的转喻思维研究，探讨词汇转喻的意义转换如何发生、人们又是如何在特定语境下识别转喻的交际意义的。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以一定语料为基础的定性分析。

本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理据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为相关研究评述，梳理国内外转喻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成果，重点评述语用学和认知语义学视角下的转喻研究，指出各研究路

向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喻研究的新视角:转喻的认知语用研究。

第三章为理论构建部分。通过对一系列语句的定性分析,作者认为单独从认知语义学或关联理论来阐释转喻的理解,都存在不足之处。但以认知语义学和关联理论在词义百科知识观上的互补性为分析框架,则可以解释转喻理解所涉及的认知和交际因素。认知语义学和关联理论都认为词语表达具有不确定性,词义的理解需参照人们的百科知识,但它们在如何调用背景知识方面,却有各自的重点和主张。关联理论是关于人们认知和交际的信息加工理论,在涉及如何利用背景知识上,强调认知的效率原则,即人类的认知处理倾向自动地扩大最佳关联。转喻恰好符合这一观点,转喻根植于人类一般的认知倾向,事物通过其突显的特征得到指认。但关联理论主要从语境因素着手解释词汇的交际意义,相对忽视了构成人们知识结构的概念机制。作者认为在不违背关联理论认知效率原则的基础上,借鉴认知语义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更充分地解释词汇转喻。认知语义学注重知识结构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认为词汇的认知意义是以人们的知识结构为背景的概念突显。转喻涉及同一认知域中概念之间的激活和映现,是“理想的认知模型”(ICM)的一种类型,保证其获得相关解释的条件是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认知语义学揭示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关系模式,即通过关系的方式认识世界,这种关系模式成为人们推理的基础和指引。然而,尽管转喻是以经验的邻近性(联想)为基础的,但并非凡是有联系或相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恰当的转喻表达方式。认知语义学关于词汇的联想意义是弥漫的,提供了许多与语境相适应的可能选择,而关联理论则试图揭示话语理解中的认知和交际制约。因此,本书采用认知语用的整合模式,提出了转喻研究的认知语用视角,以寻求在认知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联系和统合的可能性。在确立该项研究的理论框架后,本书围绕转喻理解的三个重要议题,即转喻理解的制约因素、转喻理解的认知语用机制以及转喻理解的认知效果展开论述。

第四章讨论了转喻识别过程中涉及的制约因素,如句法、语义、认知、语用等。传统语言学认为转喻的约束机制是句法上的偏离或对语义选择条件的违反。但已有研究发现,词汇的字面意义和转喻表达之间并未形成系统性差异;将谓项施加在论元上的语义限制也不能作为甄别转喻的有效标志。另一方面,认知语义学认为人们使用转喻的方式不是任意的,而是与人们感知和概念化世界的方式相联系,并提出了相对突显的一系列认知原则,但这些原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其作为制约转喻理解的充要条件。转喻的理解和使用不是孤立的,转喻出现在特定的话语或语篇中。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本研究发现语境因素对转喻的识别具有决定性作用:转喻的判定及其具体的转指内容,皆取决于转喻使用的特定语境。如在语句“The piano is in bad mood”中,用“piano”来指代演奏钢琴的人,取决于语句使用时的语境,是一种临时性的意义关系,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邻近性作为转喻的核心概念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即兴而出,特别强调对语境的依赖性。同时,转喻认知的相对突显原则也受特定语境条件制约。语境不仅仅是客观环境或文化所规定的某些固有知识,而是一种认知语境,即语境必须转化为我们的认识,才能在理解话语中起作用。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交际双方互为显映的认知语境是成功理解转喻的前提,听话人相信转喻词汇的使用并不是任意的,并在关联原则的支配下选择和构建语境,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第五章探讨了转喻理解的认知语用机制,即人们是如何确定在一定语境下词汇的转指信息的。作者认为转喻理解是人们根据认知语境建构特定概念的过程,并在认知语用框架内对这一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关联理论关于词汇的语用扩充,是以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遵循逻辑演绎的规则;而转喻是以概念上的邻近性为基础的,依托于人们的联想认知。词汇转喻的编码概念和特定概念在外延上没有交叉重合,词汇转喻中的指称转移(reference transfer)是目前词汇语用学尚未涉及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交际现

象,转喻是认知语用学不应回避的问题。在考察认知语义学的联想模式和关联理论的推理模式的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转喻理解的联想推理模式。这一理解模式是基于词汇转喻本身的特点提出的。转喻形成的动因既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同时根据关联理论,转喻在交际中的使用又能满足人们的最佳关联期待。由此可见,话语理解就是寻求最佳关联,但寻求关联的路径不同,转喻理解需考察概念之间的联系和转喻推理的作用。当词汇的外延意义或概念意义在转喻理解中丧失作用时,听话人势必更为关注词汇的联想意义。转喻理解的关键是确立概念之间的联系,但概念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动态生成的。因此,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听话人以联想认知为基础形成语境假设,确立转喻关系,并经由转喻推理构建转喻在话语理解中的交际意义。

第六章进一步讨论了转喻理解的认知效果。传统修辞学探讨转喻使用的修辞效果,大多采用例证的方式,缺乏科学的论证。认知语义学专注于听话人/说话人的心智表征和认知过程,相对忽视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少有论及。然而关联理论却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关联理论关于语境效果和认知加工之间的消长关系,可帮助人们考察转喻的认知效果。本研究尝试从三个方面分析转喻理解的认知效果,即突显语用联系、获得意境效果以及增强人际元功能等。

第七章总结全书,得出结论,同时指出后续研究的可拓展空间。本书关于转喻理解的制约因素及其推理机制的探讨,对揭示语言理解的本质有积极的启发作用:在哲学上涉及意义和指称的讨论;在语言学上与当前语义—语用界限的争论有关;在逻辑上深化了对语用推理本质的探讨。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为转喻的认知语用阐释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丰富和完善认知语义学关于转喻理论的探索,进一步扩展词汇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以弥补词汇语用学中转喻研究的空缺。本研究尚存许多不足之处,所得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Acknowledgements

To write a dissertation is to embark on a journey filled with ups and downs, yet its completion is obviously im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and support from a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made the experience of doing this research a meaningful process.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indebtedness to Professor Ran Yongping, who has carefully read every chapter, made enlightening comments on my draft and directed my sometimes scatterbrained thinking into constructive creativity. I also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Professor He Ziran, who is always ready to answer every question of mine. His informative suggestions, inspiring comments and frank criticisms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my research and academic life.

My deepest gratitude goes to Professor Wilson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for her invaluable and illuminating comments on an early proposal of this research, and her gracious encouragement always urged me to carry on my research.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Panther of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for his insightful response to my inquiry regarding metonymy understanding. I would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Professor Xu Shenghuan of Henan University. He has generously spared time to discuss with me the proposal of this dissertation, which has undoubtedly broadened my academic vision. Special thanks go to Professor Zhou Rong fro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r her scientific expertise in cognitive research and constant concern over my progress. I also want to thank Professor Jiang Wangqi of Beijing University; his rigorous scholar-

ship and precious suggestions have deeply impressed me.

Sincere thanks are due to Professor He Gang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Zeng Yantao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Professor Huo Yongshou and Dr. Xu Zhanghong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 treasure every piece of advice they have given to me, which is of great help and importance to accomplish my dissertation. I wish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Ms Krim at Zhaoqing University for her critical reading of my dissertation and improving the readability of it.

My thankfulness goes to Professor Wang Lei and his students, who helped me collect abundance of language data for my research, and Dr Aldridge and Mr Zhong Huobing, who provided me reference materials from Washington and Hong Kong, and Ms Li Chunying, who rendered me timely assistance in nee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professors working at CLAL,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who have contributed so much valuable instructions and equipped me with so many inspirations during my Ph. D. study. In addition, I want to thank my doctoral schoolmates in GDUFS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friendship shown to me. Our walking, talking, laughing and sightseeing in Baiyun Mountain will ever remain a happy memory, and I look forward very much to future play with the members of our Ping-Pong team.

Last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my family, especially my dear mother, who has always inspired me with courage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and my dear husband, who has encouraged me to persist in my pursuits, spared no effort to support me and never lost his confidence in me. Without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his Ph. D project could not have been completed.

Content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
1.1 The importance of metonymy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1)
1.2 The target of research	(3)
1.3 Rationale of the research	(8)
1.4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10)
1.5 Methodology for the research	(13)
1.6 Organiza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14)
Chapter Two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15)
2.1 Introduction	(15)
2.2 Structuralist views	(16)
2.3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emantics	(18)
2.3.1 Reference-point phenomena	(19)
2.3.2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22)
2.3.3 Meaning elaboration	(25)
2.4 The pragmatic approach	(28)
2.4.1 Previous pragmatic accounts of metonymy	(28)
2.4.2 A preliminary relevance-theoretic account of metonymy	(31)
2.5 The limitations in current accounts of metonymy	(35)
Chapter Three A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37)
3.1 Introduction	(37)

3.2	The delimitation of metonymy for the present study	(37)
3.2.1	Linguistic realization of metonymy	(37)
3.2.2	The working definition of metonymy	(42)
3.2.3	Distinguishing metonymy from metaphor	(45)
3.3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48)
3.3.1	Relevance theory	(49)
3.3.2	Cognitive semantics	(57)
3.3.3	The complementarity of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relevance theory	(64)
3.4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67)
3.4.1	Constraints involved in metonymy recognition	(67)
3.4.2	Comprehension heuristics employed in metonymy interpretation	(68)
3.4.3	Cognitive effects achieved in metonymy interpretation	(69)
Chapter Four	Constraints on Metonymy Recognition	(71)
4.1	Introduction	(71)
4.2	Syntactic constraint: syntactic deviations	(72)
4.3	Semantic constraint: violations of selection restriction	(77)
4.4	Cognitive constraint: cognitive principles of relative salience	(80)
4.4.1	Human experience	(81)
4.4.2	Perceptual selectivity	(83)
4.4.3	Cultural preferences	(84)
4.5	Pragma-cognitive constraint: the constraining influence of context	(87)
4.5.1	Dynamic context	(88)
4.5.2	Mutual manifestness	(95)

4.6	Conclusion	(99)
Chapter Five Ad hoc Concept Construction of		
	Metonymy	(101)
5.1	Introduction	(101)
5.2	Lexical pragmatics and ad hoc concept construction ...	(102)
5.3	The “transfers of meaning” issue	(105)
5.3.1	Reference transfer	(106)
5.3.2	Contextual variability of word meaning	(108)
5.4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to “transfers of meaning”	(111)
5.4.1	Cracking contiguity relations of metonymy	(112)
5.4.2	A refined relevance-guided comprehension heuristics	(121)
5.4.3	A cognitive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of metonymy: an application	(126)
5.5	Reference transfer and beyond	(135)
5.6	Conclusion	(140)
Chapter Six Cognitive Effects of Metonymy in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142)
6.1	Introduction	(142)
6.2	Economy considerations	(143)
6.3	Contextual implications	(146)
6.3.1	A trade-off between cognitive effort and cognitive effects	(147)
6.3.2	Highlighting of associative relations	(150)
6.4	Poetic effects	(153)
6.4.1	Strong and weak implicature	(154)
6.4.2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156)
6.4.3	Achieving interpersonal effects	(162)
6.5	Conclusion	(166)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	(168)
7.1 Major findings	(168)
7.2 Implications	(174)
7.2.1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sense and reference	(174)
7.2.2 Linguistic implications: semantics-pragmatics distinction	(177)
7.2.3 Logical implications: ways of inference and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180)
7.3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182)
Bibliography	(184)
后记	(199)